



《哲学与文化》丛书 | 江怡 主编

王弼《老子注》研究

蒋丽梅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哲学与文化》丛书 | 江怡 主编

王弼《老子注》研究

蒋丽梅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王弼《老子注》研究 / 蒋丽梅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2. 9

(哲学与文化丛书)

ISBN 978-7-5161-1388-2

I. ①王… II. ①蒋… III. ①老子—哲学思想—研究
②王弼(226~249)—哲学思想—研究 IV. ①B223.15
②B23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16562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储诚喜 冯春风
责任校对 徐楠
责任印制 王炳图

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 中国社科网 010-64070619
发行部 010-84083685
门市部 010-84029450
经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次 2012 年 9 月第 1 版
印次 201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10 × 1000 1/16
印张 17
插页 2
字数 288 千字
定价 4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总序：从文化自觉到哲学自觉

江 怡

中华民族正处于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时期，中华文化的复兴被看做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在这个重要历史时刻，我们能否抓住机遇，在历史文化的厚重积淀中寻找自己的定位，在传承文化的历史使命中创新自己的观念，在时代文化的多样变化中构建自己的特色，这些都是我们面临的重大历史挑战。把握好这个历史机遇，回应重要的时代挑战，不仅需要我们充分的知识准备，更需要我们的思想智慧。

当今中国的文化发展已经向我们表明，文化自觉的树立正在极大推进着我们的社会发展，文化自觉的结果将改变当今中国的文化形象。我们知道，这里的文化自觉首先是指对自身文化的强烈认同，是自身文化意识的提升，也是社会大众对文化发展的迫切要求。思想上的认同并不等同于行动上的一致。只有当我们充分认识到文化认同的重要性，并努力从行动上体现我们的文化认同，我们才能达到真正的文化自觉。文化自觉更是指思想上的自觉，是我们在思想上真正形成对自身文化性质的理解，特别是对当今世界文化发展转型过程中的不同文化形态的认识，最后构建我们自身文化的特殊性和普遍性。这里的特殊性是指，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已经体现为当今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因此，如何在当今世界文化格局中体现中国文化的特殊性，决定了中国文化的时代效应。这里的普遍性是指，中国文化的特殊性必须得到世界各国不同文化的理解，因此，这样的特殊性就必须以具有普遍意义的表达形式加以体现。只有在能够为世界各国文化理解和交流的基础上，我们的文化才能真正进入“自在自为”的阶段。然而，要做到文化的这种自觉，我们必须抓住文化的核心和精髓，这就是时代的哲学思想。确立文化自觉的关键，应当是做到整个民族在哲学上的自觉。

中华民族富有哲学思维的传统，中华文化蕴含深邃的哲学思想。无论

发展演变的规律性理解，而是以概念的方式对我们认识活动内容的抽象概括，是对事物发展规律的概念化表达。这种思维方式就要求思想以概念的方式形成对我们所认识的思想内容的表达和构造，也是对我们思想本身的概念规定。纵观我们目前的哲学思维，我们似乎缺少的正是这种对思想的主动认识。我们比较容易满足于对事物表象的理解，比较容易接受从经验中得到的知性认识，而不太愿意从概念的层面把握事物的根本性质。真正的思想应当在于能够在事物之上确立把握事物的基本原则，能够在经验之先具备理解经验的基本能力。正如黑格尔所说：“真正的思想和科学的洞见，只有通过概念所作的劳动才能获得。只有概念才能产生知识的普遍性，而所产生出来的这种知识的普遍性，一方面，既不带有普通常识所有的那种常见的不确定性和贫乏性，而是形成了的和完满的知识，另一方面，又不是因天才的懒惰和自负而趋于败坏的理性天赋所具有的那种不常见的普遍性，而是已经发展到本来形式的真理，这种真理能够成为一切自觉的理性的财产。”^①

其次，哲学的自觉在于我们能够形成对事物的整体理解，能够从较高层面把握事物发展的基本态势。马克思说：“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②这种彻底不仅表现在理论本身能够自圆其说，更重要的是理论能够把握整体，能够从宏观上对事物有完整的理解。而且，这样的理论还要在实践中得到检验，由此表明理论在实践中的彻底性。显然，这种哲学的自觉就要求我们必须认清历史的发展脉络，使理论具有前瞻性和预见性，而这种前瞻和预见正是彻底的理论自身具备的本质特征。经验主义的方法只会使我们裹足不前，完全从经验出发就会使我们“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有当我们真正形成了对事物的整体理解，只有当我们可以从宏观上把握事物的发展规律，我们才能从哲学的高度解释我们在经验中面对的各种现象，才能在事物的各种变化中把握事物的发展脉络。

再次，哲学的自觉还表现在对理论思维的自觉培养，表现为对以往哲学史的学习和理解。恩格斯说：“理论思维无非是才能方面的一种生来就

^①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贺麟、王玖兴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48页。

^②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页。

有的素质。这种才能需要发展和培养，而为了进行这种培养，除了学习以往的哲学，直到现在还没有别的办法。”^①他指出，每个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那个时代的历史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不同的内容和不同的形式。因此，只有通过不同时代的理论思维的学习理解，我们才能提升自己的理论思维能力。这里的理论思维能力主要包括两个部分，一个是科学思维能力，一个是哲学思维能力。科学思维能力帮助我们以往历史中出现的各种科学假说和科学思想形成恰当的判断，有助于我们认清我们这个时代的科学理论和思想创新程度。但科学思维能力仅仅停留在或者说只能在对经验现象的表层理解，即使是对经验现象的科学解释也不过是采用了逻辑的方法，对这些现象重新分类而已。而哲学思维能力则对我们的思维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它要求我们必须能够超越经验现象，通过对各种现象表面的理解达到对现象背后本质的把握。这就需要我们首先了解以往哲学史上所出现的各种理论观念，在历史的脉络中寻找我们这个时代出现的各种所谓新观念的历史踪迹。同时，这还需要我们具备超越历史和经验本身的抽象能力，能够从历史和经验中剥茧抽丝，形成我们自己的理论观念，用于解释我们当代的现实问题，并提出对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案。

最后，哲学的自觉更表现为对辩证法的自觉运用，表现为对“绝对真理”的放弃和对现实实践活动的最终关注。按照黑格尔的概念辩证法，思想的运动不过是绝对精神在人类思维中的变化过程。虽然这样的辩证法是以概念和现实存在的颠倒关系为前提的，但其中有一个重要思想却是我们必须牢记的，这就是说，只有当我们能够按照思维自身运动的方式理解事物的发展，也就是当我们能够自觉地运用思维的辩证法的时候，我们才能真正理解思维活动如何与现实存在之间产生矛盾和冲突，也才能真正理解为什么我们必须把思维活动的最后结果放到现实的实践活动中加以检验。这就意味着，辩证法不仅运用于思维活动本身，更是运用于我们在现实的实践活动。用辩证的方式观察事物，解释现象，提出观念，形成理论，这些就是哲学的自觉表现。

从文化的自觉到哲学的自觉，这体现了我们对自身文化的更深层理解，是我们对自身文化的负责态度。仅仅停留在文化自觉的层面，我们还

^①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4页。

只能从自身文化的特殊性上把握思想的力量，只能依靠我们对自身文化的理解体会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别。而哲学的自觉则帮助我们概念的层次上理解思想的构成和变化，从思想自身的发展中把握观念的历史作用。从更广泛的当今世界文化的视野看，能够做到哲学自觉，才会使我们的文化自觉变成具有普遍意义的行动，才会使我们自身的文化特征得到广泛的认同和理解。

本套丛书冠名《哲学与文化》，正是基于以上的考虑，因为文化是哲学的外在体现，而哲学则是文化的内在精神。我们将在本丛中陆续出版国内具有影响的哲学学者以及其他学科学者的最新著作，充分反映国内学者们在哲学与文化领域中的独特思考。

本丛书得到国家“985工程”人文社会科学创新基地“价值观与民族精神”的大力资助，特此感谢！

是《论语》、《道德经》，还是《中庸》、《大学》，这些代表着中华民族智慧的论著都充分展现了中华文化的哲学思维特征，这种特征表现为思想行动以个人认识为前提，观念形成以经验活动为前提。虽然中国哲学学科的自觉意识产生于西方哲学传入之后，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却始终是哲学式的。中国人的智慧具有这样两个特点：第一，中国人善于从身边的具体事项中发现具有普遍意义的道理，并总是试图用这些道理去理解其他相关或相近的事项，由此完成对事项的理解。在这种意义上，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更关注的是事情的过程，而不是在这个过程中呈现出的事物本身。第二，中国人对事物的理解更多地是从关系出发，更多地关注自己周遭生活环境的人和事，更多地考虑如何从各种关系中确立自己的位置。在这种意义上，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就更重视整体和全局，而不是个体和局部。由此可见，中国人的思维特征和智慧特点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对应：个人认识活动是以在身边所发生的事情为根据和出发点的，因此，中国人的思维具有经验归纳的特征；而经验活动本身又是为了更好地认识整体和全局，所以，中国人的思维又具有抽象普遍的意义。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中国人的这种思维方式并非出自我们的自觉意识，而是对前人长期生活实践的经验总结，是对中国传统思想表达的提炼升华。虽然我们一再强调中国人思维方式的特殊性和普遍性，但是这种强调却是建立在我们理解了不同于我们思维方式的西方哲学的基础之上，是我们通过不同哲学之间比较的结果。哲学思维方式的差异给我们带来了对我们自身哲学的重新认识，甚至是对自身哲学思维方式的重新定位，激发了我们全面理解自身哲学的浓厚兴趣。正是在这种思想背景中，我们开始形成对自身思维方式的自觉。

首先，哲学的自觉意味着我们对思想的主动认识。黑格尔说：“人之所以比禽兽高尚的地方，在于他有思想。由此看来，人的一切文化之所以是人的文化，乃是由于思想在里面活动并曾经活动。……唯有当思想不去追寻别的东西而只是以它自己——也就是最高尚的东西——为思考的对象时，即当它寻求并发现它自身时，那才是它的最优秀的活动。”^① 思想正是在成为自己的对象的时候，哲学由此产生。因此，哲学的自觉本身就意味着思想。这里的思想并非完全是对具体事物的认识活动，或者是对事物

^①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贺麟、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0页。

序 言

王弼（公元226—249年），字辅嗣，魏山阳高平人，是魏晋玄学的创始人物和重要代表。他的《老子注》、《周易注》是注老、注易历史上的典范之作，王弼的本末体用思想、得意忘言的注经方法使其《老子注》在众多老子注本中脱颖而出，直至今日，王弼《周易注》中对义理的重视，对象数的扫除也使得王本易注历久弥新。而其《论语释疑》也体现出魏晋时期在儒道调和上的特殊态度。王弼的玄学思想，不仅关系到正始时期的玄学发展，也直接关联到汉魏之际的思想脉络以及正始之后玄学发展的方向。

汤用彤、冯友兰、牟宗三等几位先生的力著，已基本提出了魏晋玄学研究的主要线索、人物和方法，其中“得意忘言”、“辨名析理”、“才性与玄理”等命题的提出，为研究魏晋哲学思想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角度。考察目前魏晋玄学思想研究中与王弼《老子注》相关的研究和论述，我们可以发现，这些研究大致呈现以下三种状态：

1. 魏晋玄学史或者思想史的很多著作，将王弼作为“正始玄学”的代表人物加以介绍。如牟宗三之《才性与玄理》、许抗生之《魏晋玄学史》、余敦康之《魏晋玄学史》和《何晏王弼新探》、王葆玟之《玄学通论》，其余如《玄学与魏晋社会》、《魏晋玄学新论》等论述也归于此类。诸位先生的研究注重对王弼整个玄学思想的考察，将《老子注》作为其思想的一部分，注意从《老子注》与《周易注》的关系着手来讨论《老子注》的思想。

2. 专门研究王弼的著作和论文。对王弼的研究覆盖王弼的《周易注》、《周易指略》、《老子道德经注》、《老子指略》、和《论语释疑》。这些研究有的将王弼的著作按照老子注、周易注、论语注的著作分门别类进行研究（比如余敦康之《何晏王弼玄学新探》、林丽真之《王弼》、田永胜之《王弼思想与诠释文本》，等等），有的则打破这种分别，对王弼从

中国的诠释系统，切入点主要集中在“崇本息末”、“忘象求意”等问题。

5. 比较视野里面的王注。比如那薇之《道家与海德格尔相互诠释》、王中江的《“无”的领悟及中西形而上学的一个角度》、田永胜之《王弼思想与诠释文本》援用海德格尔或者西方解释学来研究王弼的老子注，从西方哲学的角度来重新审视王弼思想和王弼对道家哲学以及中国哲学的贡献。

6. 从王弼思想入手，反思汤用彤和牟宗三先生为魏晋玄学所建构的基本结论，对王弼在魏晋玄学中的地位重新定位。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谢大宁《王弼哲学进路的再检讨》，他重新审视王弼“得意忘言”、“无”、“有”等概念，重新检讨王弼哲学的诠释进路，反对老子对王弼思想的绝对支配性，将王弼与汉儒思想史联系在一起，认为他仍然是一个气化宇宙论者。

总的说来，近人研究王弼思想的论著日渐增多，角度和研究方法也在日益创新，内容上大体沿袭汤用彤先生的一些话题或者观点，重视王弼在“启蒙时代”中用新眼光、新方法扫除黑暗，从方法论、形而上学、政治学等主要角度对王弼思想进行细致而详尽的分析。这些大量对王弼思想以及王弼《老子注》的研究，已经基本涉及了《老子注》的多个方面，呈现出系统性和完整性。但是，将注意力主要集中于王弼《老子注》，将王弼置于老学发展的内在洪流之中，将他作为一个儒道对话的中介者，目前的研究虽然对这样的角度有所涉及，但还不够深入和细致，还有可以完善和进一步挖掘的空间。

本书从文献和义理两个方面着手，直接以王弼《老子注》为研究对象，结合汉魏之际谈玄成风的历史背景，将王本《老子注》放在老子注解的系统、道家系统、儒道互补的系统中加以研究，梳理王弼在承继汉魏之学与开创魏晋玄学上的特殊功绩。分析王弼《老子注》的哲学内容和思想创新，能够更好地帮助我们理解王弼的哲学思想，从而更深入地理解王弼的思想价值和定位其历史地位。

本书第一章通过分析王弼的学术渊源、生平及交友、交游情况来说明王弼在那样年轻时就能写出这样思想成熟的作品的原因，特别是其中对王弼记述中有关黄门侍郎的分析，意在说明王弼短暂人生中的一大转折点对其政治态度、为学态度的影响。第二章则从文献目录方面整理历代关于王弼《老子注》的著录，分析各家著述中关于王弼《老子注》在分章、字

总体上进行研究（如 Rudolf G. Wagner 的 *Language Ontology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 in China*、胡海的《王弼玄学的人文智慧》等）。

3. 以王弼老子注为直接研究对象的著作和论文，如高龄芬之《王弼老学之研究》，Rudolf G. Wagner 之 *A Chinese Reading of the Daodejing: Wang Bi's Commentary on the Laozi with Critical Text and Translation* 以及 *The Craft of a Chinese Commentator: Wang Bi on the Laozi*。

这三种形态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种思路：

1. 从历史背景的角度进行研究。众多魏晋玄学史（包括思想史）的研究中，大多将王弼作为“正始玄学”的代表人物加以介绍。这种思路注重考察王弼思想的来源、背景、内容及其影响。在学术渊源上，就王弼与荆州学派的关系进行争论；在历史背景上，就《人物志》与王弼思想的关系进行辨析；在王弼思想的影响上，就前后学术风格的转变进行论证。

2. 将王弼《老子注》和其他注本进行比较研究，代表性论文是吴相武《〈老子〉河上公、想尔、王弼三家注比较研究》、胡兴荣《老子四家注研究》。前者认为王弼《老子注》重治国之道，采用“崇本息末”的方法将道家与儒家、法家思想进行融合；后者则着重通过比较发现老学发展史中道家和道教哲学观念的开发过程。

3. 以某一角度为线索，从学理上梳理王弼老子注。如牟宗三之《才性与玄理》、林丽真之《王弼》、徐大源之《王弼刑名学与解经论的研究》等，他们不集中于考察王弼《老子注》，而是将王弼的所有著作视为一个整体，从某个角度加以全面分析，主要采用的角度有自然观、有无论、圣人观、社会观、自然与名教的关系、本体论等等。其中亦对《老子注》和《周易注》以及《论语释疑》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争辩的热点是王弼以老解易抑或易解老的问题，究其根本，还在于分辨王弼在儒道调和上的成果。

4. 对王弼注解的方法和思维模式进行研究。如余敦康之《魏晋玄学史》中《王弼的解释学》和《王弼的〈老子注〉》章、刘笑敢之《经典诠释中的两种内在定向及其外化——以王弼〈老子注〉及郭象〈庄子注〉为例》、高晨阳之《崇本息末——王弼玄学体系的构建方法》、周光庆之《王弼的〈老子〉解释方法论》等等，诸先生注重从方法的创新来论证王弼在汉魏之际较之他人的突出贡献，并进而从王弼注解的方法论入手言及

数、结构的记载之间的差别，试图探究王本《老子》的本来面貌。此外，通过梳理王注《老子》的流传历史，以及现存王弼《老子注》版本之间的脉络关系，说明王本的来源，并进行弼注《老子》经文的校勘工作。

第三、四、五章则是从义理方面来分析王弼《老子注》的思想。第三章主要从道与无、本与末、心与知情欲、无为与有为四个问题出发，分析王本《老子注》与《老子》思想的歧异，王弼对这些问题的解答反映出王弼对老子思想的继承与创新，也凸显出他在儒道调和上的重大贡献。第四章则是以汉魏之际庄学复兴的大背景为出发点，分析正始名士和竹林名士在正始年间的活动以及他们对庄学的共同爱好，作为正始名士的代表，王弼虽然没有注解《庄子》，但其《老子注》中也有很强的庄学痕迹，《庄子》的精神不仅贯穿于他的玄学思想之中，也是他沟通儒道的重要渠道。第五章是对比王弼《老子注》与严遵、河上公注本之间的区别，以对哲学基本问题的解答为标准评价王注较之前注的优缺点。通过分析王注对后世老注的影响以及后世王弼形象的变化，来体现王弼《老子注》之于王弼、之于整个老注系统以及之于魏晋玄学和中国哲学的重要价值。

目 录

序言	(1)
第一章 王弼生平与学术渊源	(1)
第一节 王弼的家世与藏书	(1)
第二节 王弼黄门侍郎之憾	(5)
一 两次错失黄门侍郎	(5)
二 黄门侍郎之职	(8)
三 当代轩冕与冢中枯骨	(11)
第三节 王弼的学术渊源	(14)
一 王弼与荆州学派	(14)
二 王弼与注老传统	(16)
第四节 王弼的交游	(18)
一 交友	(18)
二 交游	(21)
第二章 王弼老子注流传及版本	(28)
第一节 有关王弼《老子注》的历史记载	(28)
第二节 王弼《老子注》历史记载中的问题	(31)
一 卷数和字数	(31)
二 名称	(32)
三 道德上下之分析	(37)
四 章数	(43)
第三节 《老子注》的成书年代及其与《周易注》的关系	(49)
一 《老子注》的成书年代	(49)
二 《老子注》与《周易注》的关系	(52)
第四节 流传历史	(54)
第五节 版本和校勘	(57)

一	版本	(58)
二	校勘	(61)
三	校勘中的一些难题	(63)
第三章	王弼的老学思想	(69)
第一节	道与无	(69)
一	《老子》原文中的道与无——道的宇宙论属性与无的 否定含义	(69)
二	王弼《老子注》中的道与无——道与无的概念置换	(71)
三	以“无”释“道”的界限及其意义	(82)
第二节	本与末	(85)
一	形而上学意义的“崇本息末”	(85)
二	方法论意义的“崇本息末”	(89)
三	解经方法的“崇本息末”	(91)
第三节	心与知情欲	(93)
一	天地以无为心	(93)
二	心之知	(95)
三	心与情、欲	(100)
四	心之境界——虚心	(104)
第四节	无为与有为	(106)
一	无所偏为	(106)
二	无为而无不为	(111)
第四章	王弼之庄学精神	(115)
第一节	汉魏之际庄学的复兴	(115)
一	汉代庄学的暗流	(115)
二	汉末魏初庄学的复兴	(118)
三	正始好庄的时风（正始名士与竹林名士的早期活动）	(124)
第二节	王弼《老子注》中的庄学精神	(134)
一	王注中的《庄子》原文	(135)
二	得意忘言	(137)
三	王弼之“理”	(143)
四	王弼“情”思	(145)
五	“通”之概念	(15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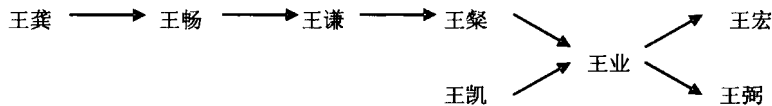
第五章 王弼《老子注》的评价及影响	(158)
第一节 王弼《老子注》的特色——与王弼前注的比较	(158)
一 思辨性	(158)
二 体系性	(164)
三 工夫论的缺失	(167)
第二节 后代王弼《老子注》的评价及影响	(169)
一 《老子注》之于王弼	(169)
二 王弼《老子注》的后世影响	(172)
三 王弼的历史形象	(175)
附录一 正始年谱	(181)
附录二 王弼《老子注》经文校勘	(188)
参考文献	(243)
后记	(256)

第一章 王弼生平与学术渊源

王弼天资卓出，注《老子》、《周易》并释疑《论语》，其中《老子》、《周易》注解立于官学，在后世产生重大影响。年不过二十四岁即能完成如此巨著，其成就固然有得于自身的天赋，却也并非偶然。王弼有着深厚的家学渊源、丰富的家中藏书，而且他所结识交游的人物均是一时俊杰，与他们的交往使他站在了时代的前沿，而正是得益于他的资质与敏悟，才让他在如此年纪就能引一时风气之先，成为正始时期的代表人物。

第一节 王弼的家世与藏书

根据何劭《王弼传》的记载，王弼的家世如下：



王弼是魏时山阳高平人，王氏是山阳的世代豪族。其祖王龚、王畅均为汉世三公，刘表曾求学于王畅。王畅之子王谦是大将军何进的长史，王谦之子王粲以文才知名，是“建安七子之冠冕”。董卓之乱后，王粲及族兄王凯避地荆州，投奔了刘表。王凯成为了刘表的女婿，生子王业，因王粲二子参与魏讽之乱被诛，曹丕以王业入嗣王粲，王业生王宏与王弼，因此王弼是王粲之嗣孙，刘表之外曾孙，家世不可谓不显赫。

虽然王弼其祖多显贵，有令名，但性格却不拘于俗。《魏书·王粲传》引张璠《汉纪》曰：

龚字伯宗，有高名于天下。顺帝时为太尉。初，山阳太守薛勤丧妻不哭，将殓，临之曰：“幸不为夭，复何恨哉？”及龚妻卒，龚与

诸子并杖行服，时人或两讥焉。

王龚丧妻悲伤过度以致执亲子礼，为时人非议，但这也反映出王龚任情纵性的气质。其子王畅守正严明，在清议中很有声望，是“八俊”之一。学中语曰：“天下楷模李元礼，不畏强御陈仲举，天下俊秀王叔茂。”王畅敢于危言危行，因此“宦竖深怨之”，后受党锢之祸的牵连而被废。王谦亦任性情，不畏权贵，《魏书·王粲传》称：

父谦，为大将军何进长史。进以谦名公之胄，欲与为婚，见其二子，使择焉。谦弗许。以疾免，卒于家。

可见王门不仅世传家学，而且对族人的气质品格的要求也非常严格。王粲博闻广识，《后汉书·王龚传附子畅传》称：

蔡邕见而奇之。时邕才学显著，贵重朝廷，车骑填门，宾客盈坐。闻粲在门，倒屣迎之。既至，年幼，容状短小，一座尽惊。邕曰：“王公之孙，有异才，吾不如也。”太祖辟粲为丞相掾，后为侍中。博物多识，问无不对。尝与人行，读道边碑，人问：“卿能暗记乎？”因使背而诵之，一文不失。观人围棋，粲为覆之，棋者不信，以帊盖之，更以它局为之，不误一道。

刘表去世以后，王粲审时度势，劝说刘表之子刘琮归附曹操。《王粲传》评价王粲“博物多识，问无不对。时旧仪废弛，兴造制度，粲恒典之”。王粲与曹丕私交甚好，东汉末年战事连绵，很多典章制度多有遗废，王粲博学多闻帮助构建了魏初的礼仪制度。“博物多识”一语夸奖的是王粲的广识和多闻，但当时能做到“博物多识”的人却并不多见，王粲学兼儒道，一方面坚信儒学教化礼仪的作用，另一方面却又企慕道家的自然境界，呈现一种矛盾的心理。而王粲的博学多闻很大程度还要归功于他的广泛阅读，这与他所获得的蔡邕藏书有着直接的联系。

根据《王弼传》所引《博物记》的记载：

初，王粲与族兄凯俱避地荆州，刘表欲以女妻粲，而嫌其形陋而